



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克明(1905-1937),本姓陶名正,1905年2月15日出生于涪陵县云集乡(今属长寿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就读省立涪陵第四中学。因积极参加董庸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杨克明化名洪涛尔,到丰都县城、高家镇等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杨克明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县组织农民起义,开展武装斗争。

1930年4月7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罗云场正式成立,后转战多地,打土豪分田地。杨克明奉中共涪陵县委指示,携带大量医药和枪弹去劳军慰问,后留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宣传队员。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红军“不纳租、不纳粮、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帮助他们组织农协。后担任二路红军游击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

在任中队长期间,杨克明率领三个分队,跟随主力,转战于涪陵、丰都、武隆、石柱等地,为争取武装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面的工作做出了成绩。1930年7月,红军在丰都暨龙整编,将两个大队合并为一个纵队,杨克明任第一中队长。

一次,丰都、彭水等县团练武装千余人,乘浓雾偷袭我军驻地,情况紧急。杨克明率队配合赵启明、陈静、周晓东等带

从涪陵走出去的红军高级将领——

杨克明

□ 冉启雷

领的各路人马向敌人发起反攻。二路红军在向忠县行军拟与三路红军会合途中,遭到强敌围困,于石柱鱼池坝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队伍损失很大。杨克明等冲出敌人层层包围,在石柱和忠县邻界的蒲家场会合,与赵启明、邓止戈等转移到三路红军游击队,不久也遭到失败。

组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

1930年冬,受党的指派,杨克明到四川营山县农村秘密开展革命斗争。他化装成一个生意人,人称“杨布客”,出没于营山安化场等地,使安化周围的绿水、安固、双河、消水、柏林、骆市等村镇农协相继恢复建立起来,革命烽火越烧越旺。1931年夏,杨克明任开江广福乡支部监委,参加组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

1932年夏,省委决定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山(山)达(县)中心县委,调杨克明任书记,领导宣汉、万源、开江、梁山等县的工作。在此期间,杨克明着重抓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健全各县县委领导机构,充实领导班子,发展党员,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增强党的战斗力。经他努力,达县很快建立了由他兼书记的党的特别支部,宣汉等地党的组织也相继恢复建立。这些组织成了农村革命活动的坚强堡垒,为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川东游击武装打下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杨克明还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自编自刻了秘密油印刊物——《战鼓》,作为中心县委的机关刊

物,宣传共产主义,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川东游击军的斗争。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适应游击区迅速发展对党的领导和干部的需要,中心县委还在赵家山、关帝庙以办学生补习班为名,举办党员训练班,为农村工作培训了一批骨干。

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杨克明在达县的几个乡里,几天内就组织了数千人参加游击队,在整个川东地区不到10天时间武装起来的游击队达3万余人。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

担任红军高级将领

1933年1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成立,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1934年4月,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红33军在万源罗文坝、长坝一带负责万源方向涌泉寺的防御任务。由于张国焘不顾事实,诬说杨克明指挥作战不力,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杨克明含着眼泪对当时曾在一起作战的魏传统说:“尽管我此去凶多吉少,但我还是为党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战斗结束后,杨克明被张国焘撤去红33军政委职务,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干事,不久,又任中国工农红军33军补充师政委和独立师师长。

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33军与红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党中央将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河

西走廊地区。

1937年元旦拂晓,董振堂、杨克明率领红五军3000余人,一举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此时,五军一部和9师、三十军分驻于临泽县城东南之沙河堡、倪家营子等地,高台与主力相距较远。正当我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庆祝高台解放的时候,马彪、马步青、韩起禄等乘我高台守军力量薄弱,且与主力配合困难之机,纠集2万余反动势力,对高台县城进行层层包围。1月12日,敌以约5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高台发起攻击。杨克明、董振堂镇静自若,认真组织防守,与敌在城外激战7昼夜,在与占绝对优势和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的激战中,伤亡较大,弹药消耗严重,被迫退入城内坚守。

1月20日,敌全力攻城,血战10余小时,高台全城陷落。杨克明、董振堂以及13师师长叶崇英等红五军将士3000余人浴血奋战,除少数冲出重围绝处逢生外,大部壮烈牺牲,年仅32岁的杨克明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马步青、马步青还惨无人道地将杨克明、董振堂、叶崇英等红军将领的头颅割下来,悬首示众,不让收尸,残酷至极。

解放后,为纪念高台死难红军烈士、教育后代,当地政府修建红军烈士纪念馆,还专门由杨克明、董振堂等修了纪念碑。当年任红33军师长的王波同志专程到高台烈士纪念馆,痛悼忠魂,写下了《哭高台》:“河西走廊冤魂,昔日红军何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

“红色掌柜”肖林

□ 庞国翔

足,决不能误事。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土特产商品的恒源字号商行在江津县城大西门附近的一条街道开张,肖林出任经理,妻子王敏卿是店员。王敏卿也是党员,是半个江津人,她出生在巴县茄子溪,从小就在白市驿读书,对江津很熟悉。江津城“恒源字号”很快赢利,肖林夫妇又将这商行开到李市场和重庆城里,设立了分号,随后又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办事处,收购土特产品。到了1944年,“恒源字号”商行扩大发展为大成公司,经营业务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在经商过程中,肖林夫妇认真研究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漏洞,与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以及经济机构斗智勇,左右周旋。从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只要南方局下达指令,需要提钱,肖林夫妇总是绝对地保障供给。

1946年5月初,根据周恩来和钱之光的指示,肖林开始把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成立了华益贸易公司,并在青岛、徐

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肖林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秘密运到上海,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华益贸易公司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这些钱,有的用于烈士的家属安抚,有的用于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补助,有的用于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的照顾,更多的则是交给了党组织,用作地下党组织开会、办报、组织罢工罢市和罢课以及暴动等。

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肖林共为党筹措了多少钱,并没有明确统计。解放后华益贸易公司等宣告撤销时,共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当时上海刚刚解放,陈毅市长为此约见时为军管会财经组负责人之一的肖林。陈市长用一口四川话说:“肖林你挣了这么多钱,有人说你是红色资本家,有人叫你红色老板,我看这都不恰当呀。你挣的钱都是为我们共产党挣的。共产党才是人民

的大老板。其实,你算是主伙的掌柜,不过你这是红色掌柜喽……”

肖林趁机说:“报告陈市长,我与王敏卿是经手了很多钱。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些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们是在为党挣钱。但我希望陈市长批准我留下三块银元,作为我两口子从事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

陈毅市长当场批准了肖林这一请求。如今这三块银元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

肖林还是一位文学青年、诗词爱好者。他在江津“赚钱”时,江津的进步书店“大公书店”还专为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南山生长着》,印了2000册。这当然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麻痹敌人和掩护好自己。肖林作为我党地下经济工作的同志,为我党的地下经济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事迹在巴蜀大地传颂。新中国成立后,肖林一直在上海市工作,曾任多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他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享受副部长待遇,于2003年逝世。



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合州情

□ 周云

那是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叶轻舟从涪江上游缓缓驶入合州城区嘉陵江水域(今重庆市合川区)。

轻舟的船头站立着一位青衫飘飘的中年人。一身儒雅的他,尽情观赏眼前的江景与岸上繁华的街市,江流、江花、航船、断岸,还有那座杜甫诗中的会江楼与挺立在嘉陵江两岸的钓鱼山、东山(今合川城南白塔坪)、宜胜山(今合川城北纯阳山),构成了一幅诗意图画。

就在站立船头的中年人陶醉于合州的山水美景时,天上突然下起一场雨来,浙浙沥沥的春雨打在江面上,好一派水墨风景!站在船头的中年人忍不住赋诗赞道:“并径东川县,山河古合州。木根擎断岸,急雨沸中流。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江花应好在,无计上江楼。”

这首名为《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又名《望合州》)的山水诗,描绘了八百多年前的合州美景,抒发了诗人对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与对“山河古合州”的高歌赞美。这位站立船头、激情赋诗的中年人,就是著名的南宋诗人范成大。

时年五十岁的范成大,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六月初四生于平江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他自幼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先从“江西派”入手习诗,后学习中、晚

唐诗风,继承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倡导的新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其诗平易浅显,清新妩媚,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作品成就最高,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同时也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范成大登进士第。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二月,任尚书吏部员外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二月,任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知州。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五月,任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范成大以集贤殿修撰出任知静江(广西桂林)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在成都任上,他励精图治,体恤民情,政声卓著。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范成大因病离任,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到达涪江岸边,经涪江乘船过合州,入嘉陵江、长江,然后出三峡,经湖北、江西进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进入吴县盐门。此次行程,范成大共著有游记二卷,赋诗数篇,脍炙人口的《望合州》便是其中一首。

尽管八百多年过去了,范成大这首描绘合州秀美风光的山水诗至今仍被合川人传颂!



□ 钟治德

三本主义的提醒

来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其实是自然的方式去尊崇自然,活在世人希冀的光亮之上,让人总是漠视它的本性。

唐朝湖州进贡名茶顾渚紫笋,装上当地茶山的金沙泉水,一道送到皇城长安。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阐释:“夫茶烹于所产处,不佳也,盖水土之宜,离其地,水功其半。”说白了,茶在产地喝最好,本地茶、本地水、本地水。《老钱游记》写品茶,有八字结论:三合其美,所以好了。

对茶谚有了新知。龙井茶,虎跑泉;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雁荡毛峰大龙湫,武夷岩茶九曲溪。诸如此类,绝非标榜名茶的遗世独秀,而是在教诲中国饮茶文化的核心内涵:本地茶、本地山、本地水,三合其美,才能葆有茶之魂魄。

茶啊,实乃是醒脑之物,提醒着吾辈无需仰望名贵茶,好喝的茶或许就在身边,名贵茶会闹水土不服。本土的茶,本土的山,本土的水,请勿辜负这种扎根乡土的提醒。

消受一杯清茶,联想种种浮躁“拿来主义”,这种提醒真功德无量。“三本主义”的倡导,美在对地理人文的坚守,环境决定品质,品质孕育人文,人文反哺其民,蕴含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提醒能让浮躁“拿来主义”刹车的逻辑蕴藏在乎它的有序推理,有力的论证,从而做出切合实际的有效抉择。

老重庆服务行业的职工,本埠早年称之为伙计、堂倌、丘二,随着时代变迁,称为练习生、茶房、侍应生、服务员等。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生意,所以但凡深谋远虑的老板,不仅在菜品方面下功夫,且非常注重选择伙计。



□ 杨耀健

老重庆的服务员

训练有素 百炼成钢

“久华源”餐馆招工,条件为品貌端正,身世清白,有介绍人,预交铺保,即保证金。新手进门先做学徒,由老师傅训练一年以上,才能接待顾客。新手可以传菜,但只能从厨房端来接菜,由老师傅端面上菜。

学徒过程,重在练习基本功,菜盘要端稳,菜名要记熟,了解顾客心理、脾气,对不同顾客针对性接待。学会熟练心算,不用算盘,不用笔。先报菜名、菜碟直径尺寸,再报酒水、主食、汤价,除店家赠菜不唱账外,其他逐一报出价钱,算出总数,并将顾客付款数和找补的钱数一并唱出,接受顾客、厨师、掌柜三者的监督,以示公正无私。

“蕲春”餐馆要求伙计,注意上菜顺序,摆放要求,如鱼头冲着主客,鸡头不朝贵宾;如蘸料放在烤鸭旁为“单上”;拔丝甜品,另外上一碗漏筷清水为“分上”;如锅巴肉片,将炸好的锅巴与汤汁分上到桌面,再合二为一叫“双上”。

“暇娱楼”餐馆着重训练布菜,偶数冷盘对称置放,走热菜切忌见缝插针,荤菜素菜间搭,麻辣糖醋相邻,花色品种均匀。一眼看去姹紫嫣红,赏心悦目,方为合格。厨工及堂倌,在营业时间不得离岗,不准接待私人来客,不准随意外出,更不能说笑打闹。

“民生”轮船公司一再强调要做好服务工作。老职工回忆说,总经理卢作孚亲自参与制定《茶房须知》《水手须知》,明文规定:“一方面为客人服务,使一切客人感受舒服;一方面为货物服务,使一切货物得到保护。”公司要求茶房(即服务员),必须满面春风迎客,代提行李入舱。行船途中,时而送茶水、热毛巾,时而嘘寒问暖,时而介绍风光,时而预报站名。凭着这份至诚,民生公司揽载了绝大部分旅客。

伶俐周到 善解人意

经过调教,伙计们茁壮成长。见有食客登门,立即笑脸相迎,根据观察和食客要求,口若悬河介绍本店的拿手菜、风味菜,千方百计刺激客人食欲,使之坚定在此就餐的决心,并引导顾客到喜欢的座位就坐。然后用抹布在本来就干净的桌面上继续擦拭,天花乱坠推荐菜品和酒饌。待顾客指定,又报唱后灶的红案厨师,其声音高昂清脆,字眼清楚,尾声上挑,余音绕梁。

资深伙计记忆力好,一眼就能认出谁是江湖大爷范绍增,谁是社会局长包华国,哪个是惹不起的孔二小姐,哪个是歪人警察局长唐毅。为这些人服务格外殷勤,夏天送冰桶,人冬加暖炉。好处是有重赏。资深伙计嘴巴甜,称男顾客大爷、少爷,称女顾客太太、小姐,称小顾客公子、女公子。见面就说:“哎呀,贵客临门,蓬荜生辉。请坐,请上坐。”饭后送牙签、漱口水、辅助小孩着衣后,还要客套几句:“今天本店人多打挤,各位没吃好。下次给你们预留雅座,还望惠顾赏光。慢走。走好。”

老市民沈智敏回忆道:“高豆花”进门左边有两个坐柜的收钱,堂倌安座摆碗筷,问吃什么,一会儿就“喊堂”进去了。”

清代《都门纪略》记述伙计行状道:“市井茶馆酒肆走堂,俗尚年轻,向客旁立,报菜名至数十种之多,字眼清楚,不乱话,不粘牙。堂内一喊,能令四座皆惊。”

仪容端庄 堪比模特

抗战前,大餐馆伙计多为男性,按时理发,不留胡须,指甲,身着制服,彬彬有礼。抗战爆发,外地人大量涌入本埠,更有外国大使馆人员和盟军官兵出没,为招徕顾客,部分餐馆引入女招待。旅居台湾的大家国秀蔡文敏回忆说:“心·心”咖啡店堂内摆设清一色小圆桌,铺亚麻布,漂亮女招待戴西式小花帽,可用国语和英语与顾客交流。

在专门接待外宾的“嘉陵”宾馆,应门的侍应生穿笔挺大衣,铜纽扣闪闪发亮,放眼一看,以为到了欧美。

世风所及 态度迥异

上世纪60年代提倡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营餐馆服务员和蔼可亲,如沐春风。顾客忌酸忌甜,嫌淡嫌咸,他们总是尽量满足。老年顾客进食慢,已经吃掉一半的菜说是要加辣,服务员二话不说照办。有人有节舍不得买汤,那就免费送一碗合汤,有点青菜叶子和葱花,还撒有椒盐和味精。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饮食服务公司不仅注重由老职工做示范的“传、帮、带”,还时常举行比赛,不断改进服务质量,赢得普遍好评。

十年浩劫社会动荡,一些服务员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不应该伺候人,于是袖手旁观,麻烦顾客自行到窗口排队取食。这样一来秩序混乱,顾客常因插队或占座发生矛盾冲突。更有甚者,有的服务员遇有亲朋好友来用餐,则瞞天过海,乱报菜名,明明只买了几个小菜牌子,上桌却是荤腥大菜。反正是国营,亏不亏本没关系。

改革开放,私营餐馆占据大半河山,懂得顾客就是上帝,服务大为改进,恢复了由服务员送菜上桌,顾客坐等,不再排队。但有的私营餐馆不注重员工培训,随便招收几个伙计跑堂。有些小饭店缺火候,传菜沿路滴滴,上桌不报菜名,胡乱布菜,甚至不慎将汤水溅到顾客身上,引起纠纷。

如何改进?向老重庆的伙计认真学习。